

浅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张建立

内容提要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既深受美国这一外在因素影响,又是皇国史观及日本人自我再生心理机制特点这一内因所致,同时也是历史认识的自身特性使然。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当前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为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的举措更加直白和多元,日本政府谋求修缮亲子模式下的日美关系的举措益发得到加强。为了消除历史认识问题的负面影响,中日两国当顺应民意,加强在环境保护、安全合作、自由贸易区建设、节能、民间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合作,切实有效地促进彼此的交流,增进彼此信赖,化解历史仇恨,共建东亚和平。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 历史认识 战争责任

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2013年4月22日就表示将在迎来战后70周年时发表一个新的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但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在2015年1月5日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安倍首相又改口称将整体继承历届内阁的谈话,但不会原封不动地沿用既往的“殖民统治”“侵略”等措辞。为了筹备战后70周年谈话,安倍首相还于2015年2月成

*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732)

**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归泳涛副教授、于铁军副教授等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章不足和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立了一个专门的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① 尽管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最终把“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这些关键词都罗列进来了,但外界依然对其褒贬不一,特别是受到来自亚洲受害国的强烈批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对当前日本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中日既有的研究成果、报刊文章、广播公司新闻、日本政府公开的研究报告及相关民调等资料,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一般包含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三个层次。其中,考实性认识是历史认识的第一层次,即通常讲的对“历史事实”的确定。抽象性认识是指关于各类历史事件对其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通常说的对历史意义或历史效应等的认识。评价性认识是指对各类历史事件做出的价值性判断。^② 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大多集中在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之主要表现——靖国神社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历史现象的梳理方面。^③ 梳理日本人相关历史认识言论可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考实性认识层面,而是存在于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无论是日本政府的相关文献,还是大多数的学者论著,乃至日本主流媒体的民众舆论调查结果均显示,日本人对日本发动的战

① 例如,2015年5月5日,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等欧美地区的187名日本问题专家出于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担忧,联名签署发表了题为“日本の歴史家をサポートする声明”(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Historians in Japan)的致安倍晋三首相英日文公开信,在积极肯定日本战后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批评安倍政权在“慰安妇”问题等历史认识上的错误立场。

② 林壁属:《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第33、36、38页;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5期,第29—31页。

③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天明:《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这一历史事实基本上还是承认的。^①例如,在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中就有如下表述:“在与日本兵戎相见的国家中,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失去了原本有着未来的生命。在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成为战场的地区,不仅由于战斗,还由于粮食不足等原因,许多无辜的平民受苦和遇难。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我国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历史真是无法取消的、残酷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梦想、所爱的家人。我在沉思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时,至今我仍然无法言语,不禁断肠。”^②

但是,在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层面,即日本人在对其发动的战争给亚洲地区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方面,则与战争受害诸国人民的看法有很大差距。为更细致地分析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把日本人细分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两大类来进行分析。

首先,日本政治精英中很多人一直不甘心将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而欲将其美化为是谋求解放亚洲的战争。例如,一直未被追究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自身就是解放亚洲的历史观持有者。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全国宣读停战诏书中就有如下表述:“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此外,1988年4月,时任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声称,白种人是亚洲的殖民者,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是“大东亚共荣圈”才使得亚洲独立。1994年5月,时任法务省大臣永野茂门称,日本为了解放殖民地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还有一些自民党议员认为,若把太平洋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则意味着把死于战争的人当作狗死了一样。1995年9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也表示,不把太平洋战争当作是“侵略战争”。^③众所周知,安倍晋三本人就是一个一心想否定“侵略战争”这一历史认识的“侵略未定义”论者。^④2015年8月

① 虽然日本人承认日军在华做过恶事,但具体到一些历史事实的细节也存在不同意见。例如,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的数字问题。有部分日本学者在“纯学术”的名义下,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感情用事,数字靠不住,甚至欲通过所谓“考据订正”“数量统计”企图来达到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② 《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2015-09-01。

③ 〔日〕浦野起央:《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几个层次分析》,刘曙琴译,《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7期,第86—87页。

④ 2013年4月22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曾称,作为安倍内阁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将在迎来战后70年的时候发表一个新的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次日,安倍又在该委员会答辩时抛出了“侵略未定义论”。

6日,在“21世纪构想恳谈会”提交的报告书中,明确承认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指出所谓日本是为了解放亚洲才发动了战争的主张不正确。^①这一历史认识虽然难能可贵,但与此同时,该报告用更多的篇幅阐述了相反的意见。例如,先是在注释中记载了反对定性为“侵略”的三点理由:(1)国际法上“侵略”的定义尚未确定;(2)即使历史地考察,对把“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军事行为断定为“侵略”有不同意见;(3)其他国家也有过同样的行为,与仅把日本的行为断定为“侵略”相抵触。^②其次,在报告正文的不同部分,对所谓的侵略未定义论进行了含蓄的介绍。如称“关于国际法上的‘侵略’的定义,虽然有联合国大会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1974年)等,但在国际社会尚难言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③“日本自1930年代至1945年间发动战争的结果使很多亚洲国家独立。”^④“无论日本是否意图解放亚洲,其结果是推动了亚洲殖民地的独立。而且,对于新诞生的独立国家,在战后,日本还通过战争赔偿乃至经济支援协助了这些国家的独立。”^⑤此外,在该报告中还对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以瓜分中国领土、吞并朝鲜半岛为目的的日俄战争给予很高评价,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俄罗斯的扩张,而且给予了很多非西方的殖民地人民以勇气。后来,1960年前后实现独立的很多亚洲、非洲国家领导人,称当年从其父辈听说日俄战争时很激动”。^⑥该报告采取以退为进的措辞,实质上极大美化了当年的侵略战争。该报告前后用大量篇幅谈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批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及韩国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感情用事的应对,甚至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的侵略战争也极力美化,强调其发动战争的客观结果促进了亚洲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行为却很少反省。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亦采纳了这种历史认识,称“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倍私人咨询机构2015年8月6日提交的报告书实质是一部新版“日本人优秀论”,其潜在的危害不容小视。

① 『20世紀を振り返り21世紀の世界秩序と日本の役割を構想するための有識者懇談会報告書』、2015年8月6日、4頁。

② 同上书、3頁。

③ 同上书、5頁。

④ 同上书、4頁。

⑤ 同上书、31頁。

⑥ 同上书、2頁。

⑦ 《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2015-09-01。

其次,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日本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在21世纪以前,虽然很多身居日本政府要职的政治精英一直不甘心把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但比较而言,普通民众头脑还是清醒的。因此,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和修宪问题上发表右倾性言论,要冒被解职的政治风险。例如,奥野诚亮、永野茂门等当年就是因其发表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而被解职。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上至首相、内阁要员,下至地方自治体首长如石原慎太郎、河村隆之、桥下彻等右派政治家,虽然他们有过类似的甚至是更为颠倒是非的言论,但其言行在日本国内既没有因此受到道德谴责,更谈不上受法律制裁,反倒出现了越发表右倾言论则越显得有人气的反常现象。从日本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即使很多人依然承认当年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但仍旧支持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且认为日本关于战争问题的道歉反省已足够充分。例如,《朝日新闻》2013年11月6日至12月20日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在被问到“你认为这场战争是否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的问题时,20—29岁的人中回答“是”的占45%,回答“否”的占33%;30岁以上的人中回答“是”的占55%回答“否”的占26%。关于“你是否赞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设问,20—29岁的受访者中回答“赞成”者占60%,3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回答“赞成”者占59%。^① 2013年7月22—23日,《读卖新闻》关于安倍首相应否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进行了一项紧急全国舆论调查,回答“应该”者占46%,回答“不应该”者占36%。^② 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的《信息7日新闻播报》于当月28日所做的网络紧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1.2%的受访者支持参拜。^③ 日本共同通信社2013年12月28—29日做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首相参拜,回答“好”的占43.2%,回答“不好”者占47.1%。^④ 2014年1月11—12日,日本新闻网(Japan News Network, JNN)对日本全国2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电话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

① 木村正人「首相の靖国参拝 朝日の世論調査でも6割賛成」、<http://bylines.news.yahoo.co.jp/kim-uramasato/20131230-00031149/>, 2015-09-01。

② 「首相の靖国参拝「すべきだ」46%…読売調査」,参见《读卖新闻》网站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TO000302/20130723-OYT1T01203.html>, 2015-09-01。

③ 木村正人「首相の靖国参拝 朝日の世論調査でも6割賛成」、<http://bylines.news.yahoo.co.jp/kim-uramasato/20131230-00031149/>, 2015-09-10。

④ 「首相参拝、評価せず47% 自民支持層に「安倍離れ」の兆候」,参见共同通信社网站 http://www.kyodo.co.jp/pol-news/2014-01-13_438798/, 2015-09-10。

社,回答“不好”者占46%,回答“好”者占42%。当进一步对做出上述两种回答的受访者,分别询问其那样认为的理由时,回答“好”者中,有62%的人认为“首相追悼战争牺牲者理所当然”。回答“不好”者中,有70%的人认为安倍此举“欠缺对外交上的考虑”。^①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回答“不好”,但并不意味着其认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影响了日本的对外交往,所以才回答“不好”。

另外,很多民调数据显示,日本民众与右派政治家的历史认识开始趋同。2015年1月至2月间,《读卖新闻》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设问是,“日本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回答“充分”者占81%，“不充分”者占15%，“未予回答”者占4%。^②另外,关于安倍将于2015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是否该继续沿用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进行“反省”和“道歉”这样的措辞,日本经济新闻社2015年3月至7月、日本读卖新闻社2015年2月至7月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应该继续沿用”者与“不应该继续沿用”者,所占比率已经不相上下。虽然仍有部分日本民众能够正确对待历史,但从日本主流媒体的民众舆论调查结果来看,日本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这一事实,着实令人担忧。

二、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

关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在相关研究论著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从外因来看,美国因素的影响无疑最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使日本失去了彻底反省战争罪责的机会。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一己之私的地缘战略需要,对日政策由战后初期的严厉改造,开始转向对日本进行庇护和扶植,甚至允许日本战犯重新掌握政权,这实质上为日本政府开辟了一条不承认侵略战争、坚持右倾史观之路;^③

① 「安倍内閣支持率は?」、参见 http://news.tbs.co.jp/newsi_sp/yonon/backnumber/20140111/q2-1-2.html。

② 「内閣・政党支持と関連問題」、参见《读卖新闻》网站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opinion/koumoku/20150226-OYT8T50104.html>, 2015-09-10。

③ 游博:《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和平与发展》2006年第4期,第52页;陈景彦:《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第4页。

第二,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其进行重大改造的同时,客观上剥夺了盟国其他成员国对战后日本国家改造的参与权,尤其是剥夺了近代以来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韩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彻底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及责任的权力。这种局面导致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上,凡事都只服从于以强者姿态出现在日本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美国,而对被日本直接侵略伤害的亚洲邻国,则难以低头认罪。^① 对于上述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这两个主要外因,部分日本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日本近现代史学家、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的论文《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战争观的变迁》对此有很详尽的论述。^②

形成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世代交替因素。有过战争体验的一代人健在者越来越少,而年轻的一代由于历史教育等原因对日本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意识已经变得很淡薄了。^③ 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称“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④ “安倍谈话”发表后,之所以受到日本民众的好评且促使安倍内阁支持率有所回升,显然与其谈话的措辞顺应了当下日本社会的发展现状及民意有关;^⑤ 第二,制度和观念因素。简言之,天皇制的保留及持有解放亚洲历史观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阻碍了日本人对其侵略历史形成正确的认识。^⑥ 这一点其实也可以说

① 卞修跃:《〈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203页。

② 吉田裕「戦後『日本人』の歴史認識/戦争観の変遷」、高橋哲哉編『「歴史認識」論争』、東京:作品社2002年版、32頁—38頁。

③ 吉田裕「戦後『日本人』の歴史認識/戦争観の変遷」、38頁。

④ 《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2015-09-01。战后以来,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较有代表性的相关讨论可参阅如下著作:家永三郎「戦争責任」(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版)、田口裕史「戦後世代の戦争責任」(東京:樹花舎1996年版)、加藤典洋「敗戦後論」(東京:講談社1997年版)、高橋哲哉「戦後責任論」(東京:講談社1999年版)、大沼保昭「東京裁判から戦後責任の思想へ」(東京:東信堂1997年版)、石田雄「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学——同化政策・戦争責任・集合的記憶」(東京:明石書店2000年版)、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真男——動員、主体、戦争責任」(東京:青土社2001年版)。“安倍谈话”虽未明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主体,但从日本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向世界宣告了今后“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日本人的子孙后代将不再承担战争责任。

⑤ 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8月15—16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问是:安倍首相在战后70年谈话中讲了“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你认为今后日本是否该继续谢罪?回答“是”者占27%,回答“否”者占63%,未回答者占10%。

⑥ 刘金才:《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154页。

是美国对日策略需要这一外因所导致的;第三,日本人心理层面即日本人自我再生的心理机制方面的原因。依靠自省“罪己”观念与凭借他力“拔楔”观念,很早就已成为日本人谋求身心新生的两个重要精神理念。所谓依靠自省“罪己”,虽表面上看是基于伦理道德标准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以退为进、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心理,并不能保证对事情有个客观的罪己。与这种一厢情愿的自省了断方式相对,“拔楔”^①则是来自于外部力量的责罚。唯有在经历一个“拔楔”的仪式和历程磨砺后,即真正求得社会的谅解之后,才可能实现众人接受的较为客观的罪己。例如,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职等以示“罪己”后再次当选复出时,便会称“拔楔结束了”,意即已经接受责罚并获得社会许可再度复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政治家尚有前嫌未释,一般也很少会有人来再翻其旧账。了解了日本人的“拔楔”心理与自省“罪己”心理,21世纪以来日本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的原因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如前所述,在对历史事实的确定即在对历史的考实性认识层面,无论是日本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大多还是承认其当年发动的战争对受害国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岸信介之类的甲级战犯的释放和一些战时领导人的官复原职、因经济成功而导致日本的自信心的不断增强,以及亚洲各受害国对战争赔偿的放弃或追讨无力,按照日本人的“拔楔”心理,很多日本人自以为其反省罪己,应该完全获得了当年的受害国的原谅,过了“拔楔”关,历史的包袱也可以卸下了。然而,当其得知自以为是的“罪己”,尚未完全获得亚洲受害国人民的谅解时,便表现得有些恼羞成怒。于是,“侵略未定义论”“解放亚洲”史观便又开始沉渣泛起。

三、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对当前日本的影响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波及方方面面,就当下而言,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的举措更加直白和多元,日本政府谋求修繕

① “拔楔”是神道中很重要的术语。据《广辞苑》的解释,其含义主要是指为了拔除灾厄、污秽、罪障等而进行的神事,或者是当人们身上有罪或污秽时,或者参加重大的神事之前,在河、海洗浴净身的行为。在日本文化中,“拔楔”既是日本神道祭礼的重要内容,也是各色日本人等依靠外部力量来净身洁心的重要仪式。经过“拔楔”,便如同除却了污秽,重获新生。参见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書店1996年版,2456页。

亲子模式下的日美关系的举措益发得到强化。

所谓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的举措更加直白,主要是指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要公然在日本国会答辩中抛出“侵略未定议论”,并且安倍晋三多次声称其战后70年的新谈话不沿用“村山谈话”中的“殖民统治”“侵略”等关键措辞。2015年8月6日,“21世纪构想恳谈会”向安倍首相提交了最终报告书。8月14日,经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发表的、参照这份报告书撰写的《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最终虽然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等关键字词,但表述极其暧昧。日本政府的中文译本是这样表述的:“再也不要重演战祸。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①显然,安倍谈话中并没有明确点出事变、侵略、战争、殖民的发动者是日本,也没有明确被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对象是谁,安倍简直就是完全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口吻在泛泛而论。虽然“侵略”“殖民”等关键字词一个都不少,但让人感觉不到他作为一个加害国的政府首脑面对遭受过日本侵略与奴役的亚洲各国人民发自内心道歉的诚意。相反,对于日本为何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走上殖民、扩张和侵略之路的原因,安倍首相过多地强调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和日本所处的环境,让人觉得似乎是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被迫走上了一条侵略他国、扩张领土之路。这一思考逻辑与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理由如出一辙,成为日本发动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合理借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卸日本战争责任的作用。

所谓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的举措更加多元,主要是指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模糊侵略历史、美化日本国家形象的举措。这方面最近有三个比较受关注的事例。第一,2015年4月27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大会审议了条约近五年执行情况,各国代表就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等进行了谈判。日本提出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70周年之际,希望全球领导人访问核爆受害地。正如中国裁军大使傅聪在联合国总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所言,日本被投原子弹是有原因的,日本如此要求其目的是要利用这种人道主义问题,以强调“受害”姿态来掩盖其作为加

^① 《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参见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 2015-09-01。

害国“侵略”的历史,在大会上强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曲解。5月12日出炉的《最后文件》草案并未包含这一提案。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国要求删除了相关内容。日本的要求被拒后,又想出了新的应对方案。2015年6月26日,外相岸田文雄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发布消息说,日本政府决定于2016年5月在广岛市召开七国集团(G7)峰会之前的外长会议。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在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举行外长会议,来为核裁军、核不扩散造势,并有意以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的国务卿访问当地的形式,展现日美和解。

第二,2014年初,日本为“神风特攻队”申遗。2015年5月13日,日本南九州市长霜出勘平、“知览会馆”馆长兼南九州世界记忆遗产推进室室长上野胜郎、“知览会馆”管理主任桑代睦雄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试图再次说明他们“申遗”行动是为了“单纯向世人传递战争惨烈程度,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第三,2013年9月1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将于2013年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推荐内阁官房专家会议提议的“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该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公约》促进和平的宗旨与精神。日方申报的23处工业遗址中,有多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了在中国、朝鲜半岛和其他亚洲国家被强征的劳工。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时至今日,许多无辜受害者的正当合理诉求仍未得到负责任的回应和解决。因此,中国与韩国都对日本政府这种推卸战争责任的申遗举措表示了反对。^①

日本社会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高涨,特别是一些日本政要肆无忌惮地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之言行,以及日本政府稀释战争责任的举措,引发了中韩两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国民感情极度恶化,日中、日韩双边关系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加之美国的相对式微、对日本安保承诺上不够明朗的态度及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等,使日本益发显得不安。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可以说“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模式,一直是日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当日美关系模式发生变化或者世界出现了有可能影响这种模式的重

① 2015年6月21日,日韩两国政府通过外长会谈,就此前态度对立的“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问题取得了共识,日韩转而合作申遗。2015年7月5日下午,在德国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对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的审议。

大因素时,日本在行为上会有更明显的缺乏安全感的表现。^①当日本明确认识到唯有修缮亲子模式下的日美关系才能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时,其相应的举措亦会益发得到强化,美主日从的特点也就会益发凸显。例如,安倍绝口不再提“摆脱战后体制”,以免刺激美国;日本顺从美国意志,不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最后关头决定不参加俄罗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典礼;安倍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把在日本国会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的安保法制改革事项,先行允诺将于2015年夏天之前完成;等等。安倍晋三此举受到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宪法学者和部分日本社会民众的批判和抵制,但其为了兑现2015年4月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所做的夏季结束前使法案获得通过的承诺,执意要在本届国会内通过安保法案,遂将本该闭幕的国会会期延长到9月27日。如此一来,若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在参议院被拖延超过两个月,则可循例启动“60天规程”(即若参议院超过60天议而未决,则视同其否决,可由众议院再度表决而最终通过),从而凭借执政党在众议院的绝对席位优势而强行闯关成功。此举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对,主流媒体每月例行的舆论调查结果皆显示,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尽管如此,2015年9月19日凌晨,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还是不顾在野党强烈反对,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法案”。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安保政策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它时隐时现,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由于上述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形成的内因和外因,特别是其根深蒂固的心理原因,显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仅仅停留在义正词严的口诛笔伐,或者是一味地给日本政府、日本人定标准而不去思考如何使其达到这些标准,则略显苍白无力。^②鉴于历史认识自身的特性所限,冀希望于立场不同的日本政治家等良心发现与受害国民众

① 张建立:《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49页。

② 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第355页。

取得关于历史认识的共识,似乎也不大现实。^① 鉴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负面影响,确实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创造中日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与日本民众交流对话的机会,有理有据地讲述历史事实,以正视听,但期望“从学术的角度促成该问题的最终解决”,^②还是难免太过理想主义化了。从官到民,也有很多人提出了通过促进民间交流来改善国民感情、化解历史仇恨的建议。的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是国与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与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增进互信的有效方式。但仅限于近年来常见诸媒体的赴日扫货所谓“爆买”这种层次的交流,恐怕非但最终不能起到正面作用,甚至可能出现负面效果。为了使民间交流真正发挥促进中日友好往来的作用,有必要借鉴一下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自1949年起,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Muzafer Sherif)曾做过一系列处理群际关系的实验,详细考察了群际关系是如何交恶,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改善,进而实现彼此认同的。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引进共同敌人的做法,将会扩大群际冲突的规模,并不能真正成功地改善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原初两个群体之间的态度发生持久的改变。^③ 通过以平等地位接触的办法,来尝试创造彼此友好的群际关系,结果也不理想。最后,谢里夫发现,只有接触并不会导致冲突的降低,必须加入另外一个要求即群体接触必须是在“两个群体有一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任何一个群体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借助自己的资源都不能单独实现这个目标”,这种目标被称为超然目标。^④ 具体到中日关系,这种需要双方在一定的共识下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完成的超然目标应该有很多。2015年10月22日,日本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联合进行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两国国民感情未见明显改善,但59.6%的中国受访者和72%的日本受访者都将“和平”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其次是“合作发展”。在改善中日关系措施、合作具体领域等方面,31.8%的中国受访者首选“加强经济关系”,其次是“促进民间对话

① 张海鹏:《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第1页。

② 张天明:《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第135页。

③ 所谓“超然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是社会心理学用语,指两个群体间为了降低彼此交往的冲突而设立的任何一个群体仅仅靠自己的努力、借助自己的资源都不能单独实现的目标。参见〔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④ 同上书,第57页。

和“文化交流”(22.4%)。32.6%的日本受访者首选“加强政治和安保关系”,其次是“在全球问题上合作”(19.1%)。对于中日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37.3%的中国受访者首选“维护东亚和平”,其次是“加强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35.1%)、“节能技术,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30.7%)。67.7%的日本受访者首选“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其次是“朝核问题”(50.9%)、“食品安全问题”(46.4%)、“维护东亚和平”(39.8%)。^①这些数据均可成为制定中日之间战略互惠的超然目标的重要参考。

虽然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并不等于现实本身,但可提供很多化解历史仇恨的启示。中日间既有仇恨,亦有千年的友好交往。中苏中俄关系也可为思考中日关系提供现实版的借鉴。中日两国人民如果能够在不断密切的交流过程中,进一步拓展中日间战略互惠的超然目标,或可以逐渐化解历史仇恨,消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负面影响,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 言論 NPO、中国国際出版集团:「第 11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15 年)」,2015 年 10 月 20 日公开发布、17 頁、41 頁。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15

Vol. 36 No. 6

FOCAL TOPIC:

New Trends of Japanese Social Thought and Strategic Concept

Japanese Academia's Cognitive Changes and Policy-Conceiv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Gui Yongtao* (11)

With the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 U. S regional influential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 S. relations, Japanese academia is anxiou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Japan-U. S. alliance and its international prestige. Japanese mainstream scholars, however, argue that the U. S.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its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long run. Based on this perception, those scholars advocate that Japan should counterbalance China more actively under the U. S supremacy. Meanwhile, through strengthening its power and promoting its geopolitical foreign relations, Japan can fill up the vacuum caused by the U. S. transition to its domestic policies. The changing cogitation to the U. S. supremacy resul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strategy. Although Japan seeks to get more power and implement the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for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t continues to be constricted by the U. 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nterests,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arrow-minded attitude to China. Ther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strategy is a gradual process.

Japanese Cognition on History *Zhang JianLi* (32)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history cognition: influenced by the U. S., shaped by Kokoku shikan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Japanese social psychology, and originated by its own history of endogenous cognition. Japanese history cognition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Japan's contemporary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more explicit and diversified measures taken to avoid its war responsibilit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solidates its alliance with the U. S. under the "oyako patter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by the history cognition, China and Japan should cooperate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zones,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tc. China and Japan can build mutual trust; eliminate historical hatred; and maintain peace in East Asia with those exchange programs.

“Pacifism” (Heiwashugi) and “Positive Pacifism”
(Sekkyokuteki Heiwashugi) in Post-WWII

Japan *Qiu Jing* (45)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s of Japanese pacifism after World War II are in controversy. The concept includes “non-war, non-military, and non-violence,” which are exchangeable with the term of “peace” or “pacifism” in Japa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Japan cherishes peace but evades its war responsibility. The Japanese definitions of “pacifism”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term’s common concept. Japanese pacifism movement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concept of “non-war, non-military, and non-violenc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acifism movements, “pacifism” was correl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thoughts, such as democracy, libe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Recently, Japanese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have proposed “positive pacifism.”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positive pacifism” varies among those icon politicians, those definitions reverse their original meaning. Meanwhile, Japanese society’s perception on the term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government. The current pacifism and its movement should be emphasized since it could be a social pressure to balance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Net uyo” in Japan *Pan Nini* (64)

“Net uyo” (online rightists) in Japan has been organized as collective actions in public instead of expressions on the Internet. The “net uyo” is ultra-exclusivism, which marginalizes them as in a lower social status. Those who maneuver discourses on the Internet and in civil society constantly identify themselves as ordinary people. The rightist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do not come from nowhere but from the consequence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in Japan have disintegrated the middle class and generated individualism, which have provoked the extremist thought and actions. The transformation